

但日本的社会层面呢？根本没有完成深度清理！”陶赋雯说。

而在德国则不然，陶赋雯从史料中看到，当年德国进行了彻底去纳粹化。比如公职人员中的纳粹很难再在战后回到原来岗位。而1970年联邦德国总统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世一跪，化解了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许多冤仇。她也在确立纳粹集中营制度的达豪集中营旧址，看到按照原样保留的相关内容，让德国人和外国游客都能认识到纳粹罪行。

何以面对未来


如今，在德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新纳粹”势力。日本更是右翼经常甚嚣尘上。但陶赋雯观察到两者的区别。其中德国“新纳粹”等等很难利用当年纳粹那些“万字旗”等等标志。原因就在于纽伦堡审判系统地进行了去纳粹化。之后，德国的教科书、法律、符号等等领域都废除了与纳粹有关的印记。但是日本则不然，那些旗帜、

歌曲等等，依然在日本社会流传，甚至有些从战后临时性替代品的地位逐渐固化、正式化。

“如今的日本，还有一些人给年轻人放旧时代的日本军歌听。那些诸如军舰进行曲之类，本身也是改编自西洋音乐，再次进行适度改编后，又有人觉得挺好听。”陶赋雯说，“慢慢地，不仅日本国内右翼感觉自己做得没错，甚而也影响到了西方。”一个较近的例子是日本男足球员三笕薰拿着一张印有二战时日本军官小野田宽郎头像的卡片，与自己效力的英超布莱顿队的青训营小球员合影。

小野田宽郎何许人也？其是在日本战败后滞留菲律宾直至1974年才最后走出山野投降者，人称“最后一个鬼子兵”。英国广播公司当年曾报道，小野田宽郎在菲律宾卢邦岛杀害了30名平民，但他投降后，菲律宾政府赦免了他。他回到日本，竟然受到了如英雄般的待遇。而如今的西方社会竟然有人接纳这种合影。陶赋雯认为，某种程度上说，日本当年的侵略，受害最深的是中国和朝鲜半岛。西方哪怕遭遇了珍珠港事件、巴丹死亡行军之类，但总体上印象不如受德国纳粹之害那么深刻。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一些日本人知小礼、拘小节的个人为人处世之道被西方人认为很有礼貌。

如此，如今的日本在某种程度还真挺受西方欢迎。比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谈之际，有种闺蜜见面的松弛感。但未来呢？

陶赋雯还向记者提及，在东京审判的同时，中国、新加坡、菲律宾等都曾开设法庭，对日本侵略者中的乙级、丙级战犯进行审判。其中中国经历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审判，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对一些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如今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树立着一块汉白玉碑，镌刻着“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此碑是由曾经关押在此的日本战犯，在释放归国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发起捐建。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终究，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有评论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博大胸怀，实践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给战犯们“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如何让后世，特别是日本社会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往事，如何让日本社会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应该成为当下日本有识之士值得研究的课题！

下图：陶赋雯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纳粹历史文献中心留影。

